

论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和当代实践^{*}

李桂华

摘 要 公共精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支撑,也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图书馆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民主的产物,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享、人权、交流、教育等内在属性“内生”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当前社会公共精神现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不相匹配,而图书馆则以多样化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回应该需求。实践类型主要包括教育导向型、传播导向型、治理导向型、社区导向型,但实践的丰富度、科学性存在不足。面对时代赋予的责任,图书馆应推动以公共精神培育为价值追求的服务创新,将公民纳入图书馆治理体系,构建嵌入性的公共生活空间;图书馆学则应加强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理论研究,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图1。参考文献64。

关键词 图书馆 公共精神培育 当代实践

分类号 G250.1

Libraries' Function of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LI Guihua

ABSTRACT

As the core demand of people's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ublic spirit is an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cy. Libraries are not only products of culture but also products of democracy.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were both benefited from social individuals with public spirit, and libraries worldwide have a rich history of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ystem in the librarianship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lso takes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ized morality including public spirit as the function of libraries. The reason behind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internal attributes such as sharing, human rights,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formed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re “endogenous” to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Among them, the “sharing” attribute is the “publicity” gen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ibraries, and the “human rights” attribute is the conceptual source of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The “communication” attribute is the practical form of the public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党建引领中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与历史启示”(编号:2021DSDJ0012)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paper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The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of Chinese Libraries Led by Party Building”(No. 2021DSDJ0012)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通信作者:李桂华,Email:1147471336@qq.com,ORCID:000-0001-8356-620X(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Guihua,Email:1147471336@qq.com,ORCID:000-0001-8356-620X)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and the “education” attribute is the social path for libraries to implement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public spiri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libraries in China have formed various practice paths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divides the relevant practice into education-oriented, communication-oriented, governance-oriented and community-oriente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method and object. Moreover, related practice is undergoing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ducation-oriented” to “governance-oriented”, from “community-oriented” to “communication-oriented”, from “communication-oriented” to “community-oriented”, and from “education-oriented” to “community-oriented”.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enrichment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cultivation of library public spirit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the unclear value orientation of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ntered on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and the lack of library-society interaction linked by the function of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libraries should adopt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paths: promoting service innovation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cultivating public spirit and bringing citizens into the library governance system; letting the public become the library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substantive participant of the library; building an embedded public living space and deepening the “people-centered” library transformation. Also, library science should develop the theory of library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function and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personal merit and public merit. 1 fig. 64 refs.

KEY WORDS

Library.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相关联,并提出要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建立这种关联实际上强调了通过文化力量来塑造人们的行为风格和提升个人素质,进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这一路径^[1]。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应充分挖掘自身的公共精神培育潜能,服务于国家社会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新时代,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点任务在于思想道德建设^[2],而公共精神是民众道德素养的核心构成^[3]。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公共精神是其有效支撑^[4],因此

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强化有助于加快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5]。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新理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因而,应将公共精神培育视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任务。尽管近年来关于公共精神培育的理论研究呈快速上升趋势^[4],但鲜见公共精神培育实践路径的研究。

现代图书馆不仅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民主的产物,在培育公共精神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公共精神构建作出了持续的历史贡献。但是,我国图书馆界对这一功能的理解和开发仍存在不足,社会治理等相关实践领域也未对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予以重点关注。在国家努力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开展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是图书馆行业回应时代需求的迫切需要。

1 公共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公共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表现为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公共责任的秉持^[6],它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表现出的关注整体发展和公共事务的价值趋向,是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协作态度、批判精神等思想境界和行为表现的总称^[7]。研究认为,应将公共精神作为促进个体自觉地以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处理公共生活中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关系的伦理标尺^[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作为治理的整体性单元,促使政府、经济、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和对话等制度性形式,实现公共目标和推进公共利益的整体性活动^[9]。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并需要依赖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得以实现。通过培育民众的公共精神,能够使众多管理主体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公共精神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具有本体性意义,又具有功能性意义和手段性意义^[10]。

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11],而公共精神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因此,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实现公共性的问题^[12]⁹¹。民主治理要求广大民众具有较高的参与热情、参与能力和参与行动,而公共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引导人们将个体能力整合服务于社会整体发展^[10]。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应当是成为既具备独立意识同时也具有公共精神的主体^[13],民众具备较高公共精神是实现较高质量民主治理的基础。

公共精神培育是公共精神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社会治理领域和教育领域对该问题已分别展开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在社会治理领域,有关公共精神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系统,主要关注如何通过环境构建来发展和维持公共精神,即采用“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然而该视角下的研究尚处于“提出问题”阶段,虽然都提及公共精神缺失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障碍^[14,15],但并未提出比较系统的公共精神培育路径。在教育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发展个体的公共精神,即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该视角的研究成果已梳理出培育公共精神的具体教育策略,但仍主要聚焦于课堂教育^[16,17]。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贯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等多层次的公共精神培育体系,我国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以课堂教育为主这一状况还有待改善。

研究公共精神培育的两个视角各自独立,且对培育公共精神的社会路径探索较少,主要涉及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没有挖掘图书馆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的巨大潜力。而公共精神培育的社会机制的缺乏会导致我国公民公共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知识和参与能力不足^[18],并进一步带来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产品破坏短缺、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秩序混沌失序等问题^[19]。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公民的公共精神培育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在当前显得格外迫切。

2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历史根基

2.1 近现代图书馆领域的公共精神培育探索

近现代以来,图书馆一直是公共精神培育的利器。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认为,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交流系统作用于全社会,塑造着社会的文化,也塑造着社会中的个人^[20]。长期以来,图书馆都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并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已然成为公共精神

培育的重要社会设置。

首先,从世界范围看,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均受益于富有公共精神的社会个体。例如,我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创办于清末的古越藏书楼,即由浙江乡绅徐树兰个人捐资建立。如今我国各地图书馆都有大量图书来自民间捐赠,并将志愿者培养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在美国,没有哪一项事业比公共图书馆更多地受益于慈善事业^[21],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卡耐基将其财富的22%用于图书馆建设,共建成2 509所图书馆^[22];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曾出现了大量私人图书馆,据统计1910年日本的公立图书馆有129家,而私立图书馆则达到245家^[23]。可以说,作为公共精神改造社会的直接成果,图书馆事业既是公共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公共精神的典型象征。

其次,中外图书馆发展中均有浓墨重彩的公共精神培育历史。近代中国引入的“公共精神”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24]。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文化唤醒民众觉悟的历史运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通过订购进步书籍、进行新书推荐、组织读书会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富有公共精神的爱国青年^[25]。可以说,通过文化来塑造公共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类似的,美国公共图书馆在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也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了公共图书馆运动,运动领导者们将其视为一项推动全体人民能够参与管理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重大的组织变革^{[26]59}。基于此,194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回顾总结美国图书馆发展史时发表了图书馆研究者狄慈恩的著名专著《民主文化的武器库:新英格兰地区和美国中部各州公共图书馆运动的社会历史(1850—1900年)》,详细描述了美国公共图书馆在19世纪中后期如何通过成人教育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准,服务于民主文化,向民众下沉。也有研究显示,公共图书馆在肯尼亚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由于图书馆在首都、城镇和乡村三个层次的发展,

培育了具有文化素质、自主人格和具有规则意识、崇尚宽容、规则与秩序的新公民,为民主的推行提供了社会基础^[27]。以上这些都是图书馆发挥其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历史事实。

再次,各国图书馆事业都将培育公共精神作为制度“底色”。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年联合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有效参与和民主发展有赖于良好的教育及对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自由且不受限制地获取……教科文组织深信公共图书馆是开展教育、传播文化、提倡包容和提供信息的有生力量,也是发挥所有人的才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个人和平与精神充实的重要机构。”^[28]中国图书馆学会2002年通过的《中国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将“拓展社会协作,共建社会文明”作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之一^[29];新西兰于1939年组建新西兰图书馆协会并颁布《新西兰图书馆协会法》,该法指出设立该协会的核心宗旨之一是致力于“使人们获得民主参与的机会”^[30];英国2003年版《未来发展框架》将“构建社会同理心”“构建富有凝聚力的社区”“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公共图书馆应具有的职责^[31],2021年版的《未来发展框架》又将“解决社会排斥问题”“构建社区认同”“培养公民意识”列为公共图书馆在现代社会的核心职责^[32]。这些制度性规定使图书馆成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制度性嵌入。

同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也将包括公共精神在内的文明道德培育作为图书馆功能的组成部分。李小缘认为,图书馆作为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和场所,有助于“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33];卡尔施泰特曾引进“客观精神”这一新概念,认为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是客观精神得以传递的场所^[34];谢拉指出,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在民主道德方面承担着义务^{[26]69};蒋永福认为,民主政治理念是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一理念通过“民主政治—公共图书馆—个人权利”和“公共图书馆—民主教育—民主政治”两条路径

实现,后者主要是通过满足公民自我教育需要、提高民主素养来对民主政治给予支持^[35]。

2.2 支撑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图书馆属性

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发挥公共精神培育作用,原因在于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具有特殊的内在规定性,而公共精神培育功能正是这些内在规定性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内生”出的重要功能。

第一,图书馆的“共享”属性——贯穿于图书馆发展历史的“公共性”基因。

共享是公共性的内蕴涵^{[12]205}。所谓共享,是指面对共同的处境,具备同等条件或需求的同样对象,能够达成秩序并一起享有。其实,知识只有共享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人类的知识共享需求正是促使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产生的社会基础。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的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和第二定律(“每个读者有其书”)均是图书馆领域知识共享思想的深刻表达。

同时,图书馆事业也在追求知识跨时空共享的实践中持续发展。例如,173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组织了一个有关图书共享的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将自己的图书带来并集中保管以供大家阅读。该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费城图书馆公司,每年根据股票收入取一定费用用于购买图书供全体成员阅读^{[26]32-38}。这种建立在自愿结合基础上的共享型“团体图书馆”就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在20世纪10—20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探索基于巡行文库的资源共享,其中武汉文华公书林通过巡回书库将馆藏装箱送到学校等机构陈列,让公众就近阅览;北京地区教育部门设置“京师小学教员巡回文库”,以满足小学教师对教学参考书籍的需求;辽宁等省的乡村流动图书馆将县图书馆的图书输送到各村阅读所^[36]。这些实践表明我国图书馆领域较早地产生了共享思想,并且一直延续这种“共享”传统。今天我国图书馆领域更是通过书目交换、资源共享、合作网络来

实现跨系统、跨国界、跨媒体、跨行业的合作共享。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共享的历史。公共意识以团结协作为行动表征,以对公共利益的认同与追求为内在品质。图书馆正是通过对共享的践行,持续涵养着各族群各阶层民众的公共精神。

第二,图书馆的“人权”属性——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理念来源。

根据罗尔斯关于公共理性形成基础的阐述,公民要成为具有理智的公民需要处于以下情景:他们互相视对方为世代社会合作体制中的自由与平等公民,愿意按照他们认为是最合理的政治正义概念彼此提供平等的合作条件^[37]。也就是说,平等的人权是公共精神的基础意涵和成长养分。长期以来,图书馆致力于消除人们获取信息的障碍,赋予每一位平民自由获取信息和学习发展的权利,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图书馆则努力消除人们获取知识和利用信息的不平等^[38],为信息获取提供“公共接点”^[39]。这种对“人权”的尊重使得图书馆成为公共精神养成的理想环境。

图书馆的“人权”属性也是图书馆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职业理念,是世界图书馆领域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之一,并通过大量制度规范得以体现。194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过的《图书馆权利法案》提出“个人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不应因为出身、年龄、背景或观点的原因而被否认和剥夺”^[40];1979年日本《图书馆自由宣言》强调“为具有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认知自由的国民提供资料和设施,是图书馆最重要的任务”^[41];1999年国际图联发布《图书馆与智识自由宣言》指出“图书馆馆藏、设备和服务应为所有用户平等利用,不应有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年龄或任何其他理由的歧视”^[42];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指出“图书馆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为天职”“图书馆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43]。

图书馆服务的平等和包容以及图书馆职业

一直所奉行的人权理念,在公共图书馆中得到更深入的体现。作为“唯一向任何人的任何问题提供答案的机构”^[44],公共图书馆本质上就是一项保障信息公平获取的社会制度,而且国际图联和多个国家均将“促进社会包容”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使命^[45]。在我国,乞讨者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均在公共图书馆享受到了“平等”的温暖。为此,图书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共生活空间,而人权理念则是图书馆面向广大民众开展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理念基础。

第三,图书馆的“交流”属性——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实践形态。

交流不仅能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形成和发展,也能使人的理性这一本质力量得以提升。因此,交流就是人们对人们的加工,是公共性产生的基础条件。而人的不同社会类型间存在知识鸿沟,知识可以起到连接社会类型的作用,汲取多元知识是培养多元化视角和塑造理性的高效途径。图书馆则是知识邂逅场所,即便是其中的书籍秩序,因其实现了对知识分类体系的物质的、物理的、空间的表达,也就具有了促进交流的社会意义。对图书馆的地理学分析则显示,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城市崛起的背后往往有大图书馆的支撑^[46]。因此,可将人类的图书馆活动理解为一种社会交流,图书馆不仅促进着“社会的知识交流”,而且促进着“社会知识的交流”^[47],这种交流属性使得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更具张力。

同时,一直以来,图书馆鼓励将口头交流与出版交流相结合^[48]。阅读社群促进了图书馆的早期产生,并一直伴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而根据今天的图书馆发展趋势,21世纪的图书馆与其说是一个接触信息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接触人的地方^[49]。读者参加读书会、讲座、故事会、真人图书馆等各类交流活动已成为常规内容,这些活动有助于识别人与人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的多样性,提升人们的批判性阅读和思考能力,增进人们在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的自我反思和成长^[50]。

当前,图书馆更是积极参与到社会交流系统的变革中。例如,图书馆界将开放获取视为公共权利问题,积极促进全球知识开放获取,推动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作为“公共资产”和“天下公器”付诸利用^[51]。图书馆正在社会交流领域担当公共政策推进者、开放标准协调者、公共利益把关人等重要角色^[52],图书馆的交流属性正在深层次影响着社会结构中的人和组织。

第四,图书馆的“教育”属性——图书馆践行公共精神培育的社会路径。

文化教育提升主体公共精神的柔性力量^[53],即所谓“以文化人”。杜威、谢拉、斯宾塞等学者都强调公共图书馆起源于社会的教育需求,认为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并将公共图书馆称为“人民的大学”。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民主的颜色,知识是引人向光明的明灯,应在劳动聚集的地方设置适当的图书馆、报社^[54];杜定友1925年在《图书馆通论》中提到“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修养”,而公共图书馆是“市民修养之中心点”^[55];李小缘认为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区别在于藏书楼是文化结晶的机关,而图书馆是文化宣传的机关^[33]。

今天,图书馆的“教育”属性已不仅仅表现为促进知识学习,更向素养、习惯、精神养成等方面拓展。例如,“阅读推广”已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信息素养教育受到广泛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应当推广全民阅读”^[56]。

教育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输送给个人,教导其如何思考、观察、判断、选择和创新,使个人成为具有民主理念或意识的公民^[57]。而图书馆作为“人民的大学”,其形象已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能够通过培养广大民众的阅读能力和信息能力、促进民众理性思维养成来推动公共精神的形成。

3 公共精神培育的当代需求和图书馆的实践回应

3.1 新时期公共精神培育的迫切需要

尽管当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事实上,我国社会公共精神现状与这一要求并不匹配,其现象表现和主要原因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陌生人时代”社会疏离、公共生活瓦解,公共责任缺失。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公共生活空间多样,地缘、血缘、亲缘都能成为公共生活的纽带,但如今已从这种传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转变^[6]。城市在为人们带来机会及提供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疏离,并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58]。在这种情况下,邻里关系淡漠,社会纽带松弛,“宅文化”却成为时尚。

“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与当前公共空间不足、公共生活瓦解有着密切关联。公共生活具有互动性,有助于社会理解和共识的形成,也有助于公民理解自身的公共责任角色,形成公共责任意识和行为习惯。但在高度开放、流动和分化的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却越来越艰难。“陌生人时代”如何构建更理想的公共生活是当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第二,消费主义主导下工具理性盛行,公共参与动力不足。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区分了四种“干扰人们进入真理之门”的“假象”:族类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剧场的假象、市场的假象^[59]。其中,市场的假象指人类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的认知障碍。当前,市场经济使社会进入个体化时代,城市社会的深层逻辑是资本对利益的追求^[60],消费主义已成为主导生活的思维模式,即便是具有理想主义抱负的青年也可能被这种市场假象所迷惑,继而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明星崇拜、物质浪漫盛行都是其外在表现。

对个体利益、短期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导致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以公共利益为追求的价值取向式微、精神浪漫匮乏,必然导致公共参与动力不足。如何在社会层面构建个体意义感和更具理性的精神归属,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网络空间内知识剥离和时间压缩,公共理性难以建立。

互联网对生活世界的快速渗透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主要的公共空间,但这一空间有自身弱点:一方面,网络空间是市场主导的弱道德约束空间,优质知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越埋越深,甚至有被剥离出主要市场的趋势,而泛娱乐化、极端化的态度表达却成为主流,抑制了公共理性的生长;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又是一个时间压缩空间,快节奏、高密度的信息流动导致被动的知识获取和线性思维成为常态,难以形成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

在网络时代,我们正被信息淹没但却乏于知识^[61],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悬浮时代^[62],分化与整合、活力与秩序的张力越来越大^[63]。在网络生活中人们难以深刻认知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关系,思考能力和理性批判能力也面临退化,责任伦理遭到冲击。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公众理性思考的能力成为当前社会需要积极探索的紧要问题。

3.2 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回应

面对公共精神建设的时代需求,近年来我国图书馆领域延续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传统并不断开拓创新,以服务实践回应当代需求,已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从方法和对象两个维度对相关实践进行初步梳理。

图书馆主要采用促进参与行动和提升参与能力两种方法来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一方面,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行动有助于内化公共意识,并使公民的公共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提升公民的公共服务参与能力有助于创造公共参与机会,并使其公共精

神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促进能量。基于此,本研究将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方法维度分解为“作用于能力”和“作用于行动”两种方法,如图1纵轴所示。

同时,公共精神培育往往被融入到图书馆日常服务和活动中,对不同类型的目标对象产生作用,而目标对象主要包括聚焦个体和聚焦群体两种选择:以个体为对象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以驱动个体参与为诉求,采取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以群体为对象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则往往直接以改变群体认知为起点,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因此,本研究将公共精神培育的对象维度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群体为对象”两种对象,如图1横轴所示。

根据当前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在方法和对象两个维度上的实践表现,本研究将其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即围绕个体—能力的教育导向型、围绕个体—行动的传播导向型、围绕社会—能力的治理导向型、围绕社会—行动的社区导向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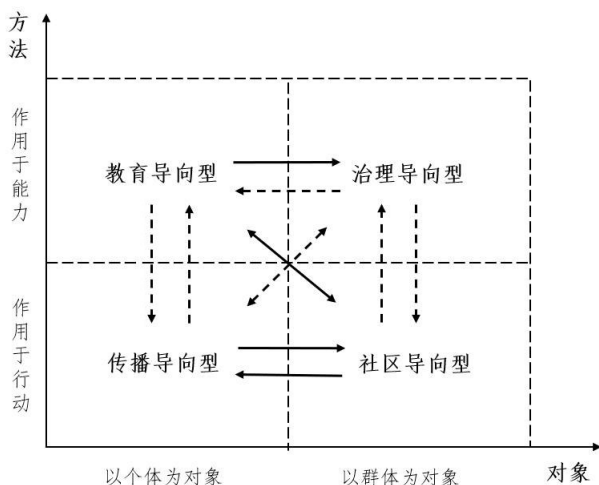


图1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类型

3.2.1 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个体的公共服务能力的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往往立足于通过教育手段来提升公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使个体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目标相联系,强化其公共价值感,重塑个体对象的理性主体地位,因此本研究称之为“教育导向型”。

教育导向型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通常基于长期服务制度或以系列活动形式展开。例如,杭州图书馆的公益培训班自2008年开办,以“教师公益、学员免费”为特点,基于“以公益回馈公益”理念组建了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市民志愿讲师团队,无偿为市民开设各类培训课程、提供专业辅导;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政府

支持下从2012年开始实行“阅读推广人”培育计划,已经完成了九期培训,培育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近千名学员,这些阅读推广人积极向公众传播阅读理念、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基于图书馆知识交流的本质和阅读推广理念进行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价值动员过程,它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机会,有助于建立公民之间丰富的交往关系,对重构公共生活而言是一个高效率途径。

3.2.2 传播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个体的公共服务行动的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往往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倡导社会个体的公共服务行为,具有较强的传播属

性。近年图书馆行业开展的图书漂流、共享图书、图书推荐等活动,均立足于引导人们完成一次具有公共价值的行为,以个体行动作为传播纽带,让公众作为贡献者亲历公共服务活动,传播公共服务价值。

传播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通过行动来激发人们的参与动力,激活参与潜能,我国图书馆行业已涌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创新。例如,苏州图书馆开展“我是你的眼”视障读者主题活动,组织由各界爱心人士担当志愿者的“盲人读书会”,为视障读者解读名著,介绍各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该活动已坚持开展 20 年,服务视障读者四万余人次;嘉兴市图书馆于 2008 年开始向全市招募“夕阳红 E 族”信息素养教育社会团队,辅导老年人学习使用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迄今已举办培训数千次。

图书馆是一个高参与性的公共空间。而公共参与行动是公共精神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加深社会成员对社会责任和公共精神的情感体验,使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人格化、责任化、道德化^[64]。传播导向型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往往将图书馆作为沟通平台,形成公众相互服务的空间,达成公共价值追求共识,在相互服务中孕育和传播公共精神。

3.2.3 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群体的公共服务能力的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着力于通过构建公共领域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水平,具有治理机制创新的特征,因此我们称之为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此类公共精神培育实践致力于为公共参与提供制度化、组织化渠道,使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嵌入”图书馆服务制度和体系中。

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法人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日益增多。如佛山市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正在探索“市民馆长”制度,即市民以文化志愿者身份担任图书馆“馆长”,参与图书馆管理、运营以及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这些“市民馆长”在阅读推

广、智能图书馆建设、城乡服务一体化建设等领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四川大学图书馆本着“服务学习”理念,设立“学生馆长助理”制度,也是图书馆治理方面的创新探索。

治理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立足于治理制度,促成图书馆治理效能和公众公共参与能力的双向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新尝试,在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上具有突出优势。

3.2.4 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作用于群体的公共服务行动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通常利用图书馆及其所在区域的公共空间,培育公共服务社群,发现并激发合作、交往和互惠需求,建立社会互动网络。因此,本研究称之为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

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基于对图书馆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和深度利用展开。例如,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创的公益普法服务项目“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志愿者由来自全市 57 家律师事务所的 80 名执业 5 年以上的专职律师担任,成为专业人员与法律信息需求者之间的交流平台和公共服务的虚拟社区;获得 2020 年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第一名的佛山市图书馆“邻里图书馆”项目将分散在各个社区的 1 368 个普通家庭变为公共图书馆(截至 2022 年 5 月数据),为社区居民营造了深度交流的新型空间,同时滋养和提升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参与动力。

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实践往往立足于虚拟社群或线下社区,通过社群或社区来承载公众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进而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共同体。构建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精神培育体系有助于拓展公共精神的实践场域^[7],提升个体在群体中的归属感,进而在文化合作过程中发展积极的协同共建关系。这是依靠社会自主力量矫治公共精神失落问题的有益尝试,也体现出图书馆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的巨大潜力。因此,日益融入社区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社区中优质公共精神培

育的空间,填补当前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的空间空白,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3.3 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趋势与局限

3.3.1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的融合转变

图书馆是不断发展的有机体,我国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也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是各类实践探索正在发生融合转变,并已出现以下转变路径(见图1)。

路径1:从“教育导向型”向“治理导向型”的转变。如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进一步推进“阅读推广人”培育计划,于2017年3月成立“深圳市阅读推广人协会”,制定《深圳市阅读推广人协会章程》,形成稳定的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升级搭建整合性公共精神培育平台,提升社会影响力。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向治理导向型的升级将深度提升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活动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推动社会公众对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广泛认知。

路径2:从“社区导向型”向“传播导向型”的转变。如佛山市图书馆在“邻里图书馆”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易本书”平台,构建家藏书流通系统。市民既可以基于“易本书”小程序上传家中闲置图书供人借阅,也可以在平台借阅别人上传的藏书,突破了社区的地理限制,促进公私藏书共融、互动,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共享”效用。从社区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向传播导向型的转变将推动公共文化互助活动的进一步大众化。

路径3:从“传播导向型”向“社区导向型”的转变。如2020年2月嘉兴市图书馆“夕阳红E族”已开始推广到村分馆,向农村全域覆盖。该项目依托新塍镇老年大学开展合作办学,联合开展老年人信息技能比赛。从传播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向社区导向型的转变过程中,个体公共参与者在特定社会空间中与其他群体相互激励、相互感召,并提升个体信念感、价值感、公共服务愉悦感,深化公共精神培育效果。

路径4:从“教育导向型”向“社区导向型”的转变。如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延伸其“阅读推广人”计划,开展“喜阅读读书会”等活动,并实施“蒲公英”阅读计划和“康乃馨”阅读计划等,让阅读推广人积极投身到社区服务中,推动整个城市的全民阅读工作。“喜阅读读书会”目前已经举办数百场,该项目获得了广东省首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优秀创新范例”,“蒲公英”阅读计划和“康乃馨”阅读计划分别向外来务工集中地区和儿童医院输送资源和服务,由阅读推广人为劳务工子女、病患儿童、特殊(残疾)儿童开展专业阅读辅导。教育导向型公共精神培育向社区导向型的转变,实现了从公共服务能力到公共服务行动的贯通式促进,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活动的效能,也将孕育高质量的公共精神培育机制。

当然,以上融合转变路径仅是对所观察到的典型实践个案的归纳,随着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其他更多的转变路径仍可期待。而随着实践的探索,更多图书馆在公共精神培育过程中开始兼顾对个体和群体的双向引导,以及对公共服务能力和行动的双向促进,未来图书馆事业将以更具建设性的角色深入参与到我国社会文明建设进程中。

3.3.2 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实践的当前局限

尽管我国图书馆领域的公共精神培育实践不断创新,但实践的丰富度、科学性均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导向不明晰。图书馆在实践过程中通常将公共精神培育视为其他功能的附加价值产出,而非作为独立目标追求,因而缺乏系统的工作思路和框架。如图书馆通常将志愿者项目目标确定为“志愿者为图书馆服务”,而不是“图书馆通过培养志愿者、服务于志愿者,进而服务于社会”。价值导向模糊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实现。

其次,未建立以公共精神培育为中心的质量管理机制。尽管公共精神培育已成为图书馆

服务实践的价值产出,但在服务过程中并未将其纳入管理对象,如未从公共精神培育视角观察和组织图书馆相关服务实践、未追踪公共精神培育效果等。这一状况不利于形成服务质量提升闭环,难以构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公共精神培育品牌项目。

再次,缺乏以公共精神培育功能为纽带的图书馆—社会联动。公共精神培育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较多社会单元已经构建了相关功能机制,应通过社会联动形成合力。但目前仅有较少的图书馆以公共精神培育为纽带建立了与其他相关社会治理单元的关联,这限制了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利于社会形成关于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广泛认知。

4 我国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的发展路径

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国家战略需要,图书馆行业不仅应将公共精神培育视为图书馆的重要功能,而且应将其视为时代赋予图书馆的一项重要责任,毕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图书馆就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的。同时,这项责任的履行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只有与社会共振、融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才更为显见,并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和制度支持。

那么,新时代图书馆应怎样更好地践行公共精神培育功能、履行公共精神培育责任呢?基于对当前实践的观察,本研究认为有以下四方面的发展路径。

第一,推动以公共精神培育为价值追求的服务创新。只有明确的价值追求才能催生更具深度的服务创新,我国图书馆领域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诉求,进而催生更广泛的创新实践。一方面,图书馆应基于自身天然的“亲民性”,通过方法创新、内容创新提升公

民公共服务参与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应建立与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丰富联结,通过更主动、更开放、更多样的社会联结来构建公民公共参与网络,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公共参与机会。

第二,将公民纳入图书馆治理体系中,让公众成为图书馆的实质性参与主体。我国图书馆领域已启动多元治理体系的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法人治理改革、企业责任承包制改革等尝试正在大面积展开。这些现代化治理手段在提升图书馆治理效率的同时,其实也兼具培育公众公共精神、激活个体公共参与积极性等作用。图书馆应以治理体系改革为契机,带动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参与图书馆治理过程,使图书馆成为更具建设性的公共精神培育平台。

第三,构建嵌入型公共生活空间,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图书馆转型理念。从“以书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型,是对图书馆“知识交流”本质的进一步挖掘,会促进图书馆成长为社区中心,甚至社会中心。读书作为一种间接交流过程,只是一种基于逻辑的理解,而面对面的知识交流可以做到拟情式理解,利用心灵的可沟通性能使知识因心灵的情感能力而得到更深入、有效的传递,提升交流的质量和内化效果。因而,融入社区是图书馆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高效途径,从而通过促进民众间相互服务来塑造公共精神。

第四,加强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公共精神培育是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新任务,也是中国特色话语,图书馆学应将其视为图书馆的重要功能加以系统研究。应当注意到,图书馆的公共精神培育功能这一阐述与西方国家关于图书馆与“市民社会”发展间关系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市民社会”是社会—国家二元对立视角下的产物,而公共精神培育诉诸“有机的团结”,通过相互合作增进共同利益,以实现从“连接”到“团结”的良性转变为取向。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理论建设也应以此为逻

辑起点。

面对公共精神培育这一时代使命,图书馆学有必要对个体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活动开展深入研究,探索知识交流与其之间的关系,研究

个体之善与公共之善的转化路径。只有对社会认识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为图书馆公共精神培育功能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并催生图书馆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丁元竹,江汛清. 推动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J]. 前线,2021(2):32-35. (Ding Y Z, Jiang X Q. To push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o a new height[J]. Qianxian, 2021(2):32-35.)
- [2] 石书臣.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与实现民族复兴[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4):50-58. (Shi S C. Raising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J]. 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18(4):50-58.)
- [3] 唐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公共精神的培育[EB/OL]. (2021-07-21)[2022-06-03]. http://www.cssn.cn/zx/bwyc/202107/t20210721_5348821.shtml. (Tang B. The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EB/OL]. (2021-07-21)[2022-06-03]. http://www.cssn.cn/zx/bwyc/202107/t20210721_5348821.shtml.)
- [4] 何齐宗,苏兰. 我国公共精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江西社会科学,2018(1):199-207. (He Q Z, Su L.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ublic spirit research in China[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8(1):199-207.)
- [5] 谈慧娟. 重视社会治理中的公共精神培育[N]. 学习时报,2020-08-05(07). (Tan H J.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in social governance[N]. Study Times, 2020-08-05(07).)
- [6] 李欣. 良序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公共生活的重建与协商民主的发展[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6):52-61. (Li X. Why good order public life is possibl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fe and development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Journal of Zhejiang Party School of C. P. C, 2017(6):52-61.)
- [7] 韦仕祺. 公共精神的失落根源与矫治[J]. 人民论坛,2019(24):54-55. (Wei S Q. The root of loss of public spirit and its correction[J]. People's Tribune, 2019(24):54-55.)
- [8] 杨淑萍. 公共精神的生发逻辑及青少年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J]. 教育研究,2018,39(3):27-34. (Yang S P. On the public spirit's innate logic and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youth public spirit[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8, 39(3):27-34.)
- [9] 高奇琦. 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J]. 中国社会科学,2020(7):81-102. (Gao Q Q.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0(7):81-102.)
- [10] 赖纯胜.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公共精神的培育[J]. 学术论坛,2015(4):9-13. (Lai C 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J]. Academic Forum, 2015(4):9-13.)
- [11] 俞可平.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 (Yu K P. Essay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M].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4:13.)
- [12] 刘鑫森.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培育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Liu X M.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in contemporary China[M].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13] 夏志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J]. 中国社会科学,2020(5):4-27. (Xia Z Q. The conversion of logic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0(5):4-27.)
- [14] 笪素林. 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J]. 南京社会科学,2006(9):92-97. (Da S L.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pirit[J].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2006(9):92-97.)
- [15] 马静.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公共精神的重塑[J]. 广西社会科学,2017(4):139-142. (Ma J.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irit[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2017(4):139-142.)

- [16] 朱承. 公共精神培育:新文科的天然使命[J]. 探索与争鸣,2022(3):18-21. (Zhu C.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the natural vision of new liberal arts[J].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2022(3):18-21.)
- [17] 吉喆,崔艳龙. 重大疫情中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路径研究[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1):137-142. (Ji Z,Cui Y L. Research on public spirit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major epidemics[J].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2021,37(1):137-142.)
- [18] 胡艳蕾. 论公民公共责任意识培育机制的路径建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23-126. (Hu Y L. Approaches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system of citizens[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2013(3):123-126.)
- [19] 陈潭.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J]. 中国软科学,2003(9):139-144. (Chen T.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s;the cri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ssibility of overcoming them under non-cooperation game[J]. China Soft Science,2003(9):139-144.)
- [20] Schiller H I,Schiller A R. Libraries,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and commerce[M]//Mosco V,Wasko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146-166.
- [21] 曹海霞. 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探析(1850—1900)——解读《民主文化的武器(Arsenals of A Democratic Culture)》[J]. 图书馆杂志,2012(6):14-19. (Cao H X.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y'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1850-1900)[J]. Library Journal,2012(6):14-19.)
- [22] Slyck A V. Free to all;Carnegie libraries and American culture,1890-1920[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5-10.
- [23] 李易宁. 日本私立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J]. 图书馆,2015(7):39-44. (Li Y N. History and actuality of the private libraries in Japan[J]. Library,2015(7):39-44.)
- [24] 刘京. “公共精神”和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索历程[J]. 社会科学战线,2005(6):184-187. (Liu J. “Public spirit” and the moral exploration 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s[J]. Social Science Front,2005(6):184-187.)
- [25] 常进军. 李大钊教育改革思想述论[J]. 教育探索,2016(1):7-10. (Chang J J. On the Li Dazhao's ideology of educational reform[J]. Education Exploration,2016(1):7-10.)
- [26] 谢拉. 图书馆引论[M]. 张沙丽,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Shera. Introduction to library[M]. Zhang S L,trans. Lanzhou:Lanzhou University Press,1986.)
- [27] 于国辉,严潮斌. 公共图书馆在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研究——基于肯尼亚的案例[J]. 国际论坛,2013(3):73-78. (Yu G H,Yan C B. The utility and problem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with Kenya as a case study[J]. International Forum,2013(3):73-78.)
- [28]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吴建中.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J/OL]. 中国图书馆学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746.G2.20220809.1750.002.html. (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2[EB/OL]. [2022-08-04].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06/1/IFLA-UNESCO%20Public%20Library%20Manifesto%202022.pdf.)
- [29]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EB/OL]. (2002-11-15)[2021-04-20].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2030.html.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librarians in China (trial)[EB/OL]. (2002-11-15)[2021-04-20].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2030.html.)
- [30] The New Zealand Library Association Act 1939[EB/OL]. (1939-09-29)[2022-06-04]. https://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39/0017/latest/096be8ed80a6f8cb.pdf.
- [31]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of England.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action plan 2003-06[EB/OL]. [2022-06-04]. https://catalogus.boekman.nl/pub/E03-677.pdf.
- [32] 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 of England. Framwork for the future[EB/OL]. [2022-06-04]. https://libraries.communityknowledgehub.org.uk/sites/default/files/framework_for_the_future1.pdf.

- [33] 李小缘. 全国图书馆计划书[J]. 图书馆学季刊, 1928, 2(2): 210-234. (Li X Y. National library plan[J].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8, 2(2): 210-234.)
- [34] 吴慰慈, 董炎.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9. (Wu W C, Dong Y.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9: 9.)
- [35] 蒋永福. 现代图书馆的五大基本理念[J]. 图书情报工作, 2009(21): 11-16. (Jiang Y F. Modern library's five basic philosophi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9(21): 11-16.)
- [36] 范并思.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菲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184-189. (Fang B S. Library science in the West and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outline based on the Delphi method assessment[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6: 184-189.)
- [37] 约翰·罗尔斯. 公共理性观念再探[G]//哈佛燕京社, 三联书店. 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6. (Rawls J.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G]//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c reason and modern scholarship.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6.)
- [38] 刘兹恒, 李武. 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弘扬和延伸[J]. 图书馆, 2004(4): 1-4. (Liu Z H, Li W.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digital age[J]. Library Journal, 2004(4): 1-4.)
- [39] Feather 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M].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Ltd. 1994: 112.
- [40]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Library bill of rights[EB/OL]. [2021-04-20]. <http://www.ala.org/advocacy/intfreedom/librarybill>.
- [41] 日本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自由宣言(1979年修订)[EB/OL]. (1979-05-30)[2022-06-05]. https://www.jla.or.jp/portals/0/html/jiyu/freedom_chinese.pdf.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declaration of library freedom (revised 1979)[EB/OL]. (1979-05-30)[2022-06-05]. https://www.jla.or.jp/portals/0/html/jiyu/freedom_chinese.pdf.)
- [42]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EB/OL]. (2000-01-06)[2021-04-20]. <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statement-on-libraries-and-intellectual-freedom>.
- [43]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服务宣言[EB/OL]. (2008-10-28)[2022-06-04].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2029.html>.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Library service declaration[EB/OL]. (2008-10-28)[2022-06-04]. <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60/2029.html>.)
- [44] 肯尼斯·E·道林. 电子图书馆[G]//刘嘉, 张广钦, 田凯, 等. 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 96-104. (Dowlin K E. The electronic library: the promise and the process[G]//Liu J, Zhang G Q, Tian K, et al. Selections of classics on library science translations of important foreign works in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Huayi Press, 2002: 96-104.)
- [45] 马春. 社会包容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6, 60(24): 58-62. (Ma C. Research on public libraries' services within the social inclusion field of visio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6, 60(24): 58-62.)
- [46] 彼得·伯克. 知识社会史: 从古登堡到狄德罗[M]. 陈志宏, 王婉璇,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56-85. (Burke P.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M]. Cheng Z H, Wang W N, tran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56-85.)
- [47] 刘宇, 许鑫. 知识交流论与本质主义知识生产——纪念黄纯元先生逝世20周年[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0(2): 44-50. (Liu Y, Xu X. The knowledge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essentialism: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Dr. Huang's death[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20(2): 44-50.)
- [48] 于良芝. 图书馆学引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59. (Yu L Z.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59.)

- [49] Imholz S. Public libraries by design; embracing change at low cost[J].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2008, 27(4): 335-350.
- [50] Fister B. Reading as a contact sport; online book group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reading[J]. Reference & User Services Quarterly, 2005, 44(4): 303-309.
- [51] 张晓林. 推动开放获取 履行社会责任[J]. 中国科学基金, 2015(5): 321-322. (Zhang X L. Promote open access and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J]. Bulleti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015(5): 321-322.)
- [52] 张晓林. 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1): 4-16. (Zhang X L. Disruptive changes and the post-library era: toward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 of knowledge service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8, 44(1): 4-16.)
- [53] 王洪波. 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下主体公共精神的当代建构[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4): 47-52. (Wang H B.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public spirit under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J].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20(4): 47-52.)
- [54] 李大钊. 劳工教育问题[N]. 晨报, 1919-02(14-15). (Li D Z. Labour education[N]. Morning Newspaper, 1919-02(14-15).)
- [55] 杜定友. 图书馆通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42-44. (Du D Y. General theory of library[M].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5: 42-44.)
-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3.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7: 3.)
- [57] 蒋永福. 公共图书馆与民主政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9(5): 10-14. (Jiang Y F. Public libra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9(5): 10-14.)
- [58] 帕克, 伯吉斯, 麦肯齐. 城市社会学;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 宋俊岭, 郑也夫,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7. (Park R E, Burgess E W, McKenzie R D.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the urban sociology of the Chicago School[M]. Song J L, Zheng Y F,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2: 27.)
- [59]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8-21. (Bacon. Novum organum[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6: 18-21.)
- [60] 大卫·哈维. 资本的城市化;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M]. 董慧, 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234. (David H.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M]. Dong H, trans.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4.)
- [61] 沃尔特·克劳福德, 迈克尔·戈尔曼. 未来的图书馆: 梦想、疯狂与现实[G]//刘嘉, 张广钦, 田凯, 等. 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2: 73-84. (Crawford W, Gorman M. The future library: dreams, madness, and reality[G]//Liu J, Zhang G Q, Tian K, et al. Selections of classics on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Huayi Press, 2002: 73-84.)
- [62] 严飞. 穿透,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36. (Yan F. Penetrate and think like a sociologist[M].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20: 36.)
- [63] 冯仕政. 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 从连接到团结[J]. 社会学研究, 2021(1): 1-23. (Feng S Z.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life: from connection to solidarity[J]. Sociological Study, 2021(1): 1-23.)
- [64] 郑士鹏. 公共精神培育与社会责任建构——学习伟大抗疫精神启思[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Z1): 119-125. (Zheng S P. Cultivation of public spirit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arning from the great anti-epidemic spirit[J]. 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20(Z1): 119-125.)

李桂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1。

(收稿日期: 2021-12-16)